



孔目湖讲坛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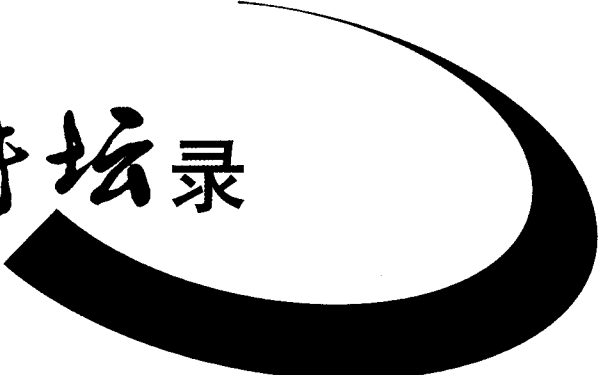
KONGMUHU JIANGTAN LU

主编/张安哥 副主编/吴传骏/何永峰

江西人民出版社



孔目湖讲坛录



主 编 / 张安哥

副主编 / 吴传骏

/ 何永峰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目湖讲坛录/张安哥主编.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210 - 03388 - 2

I. 孔... II. 张...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098 号

孔目湖讲坛录

张安哥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95 千 印数: 1 - 2000 册

ISBN 7 - 210 - 03388 - 2/C · 89 定价: 36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E - mail: jxp-ph@163. net web@jxp-ph. 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2003年3月,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讲坛”开讲。

孔目湖,华东交通大学的一座校内湖,四百亩的水面,风光秀美,它的灵气滋养着这里的师生。以此为人文讲坛命名,是期望讲坛所张扬的人文精神如这静静的湖水,润物细无声,渗透进师生的心田。

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的高等院校,开办人文讲坛,提高境界,开阔眼界,广邀国内知名学者进行学术演讲,对营造校园人文氛围,使大学校园更加生机盎然,青春焕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每周一期的讲座,使师生可以亲耳聆听学者的教诲,受到学者思想上的启迪,又可以感受其迷人的魅力和神韵风采。报告厅里,场场爆满,听人文讲座,已成了许多学生的期盼和精神享受。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有一百多位学者来到孔目湖讲坛。为在更大范围传播人文知识,我们将前100期的部分学者的演讲内容编辑出版,这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演讲内容对听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和回味。

先进文化的浸润,必定会有益我们自身的气质、品位、神韵的养成与提升。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在探寻文明与文化的长路上继续奔行。

编者

2006年2月28日

◎桑玉成

人类政治知识增长与政治文明的演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晚上好！今天非常有幸来到孔目湖讲坛。我讲的题目是《人类政治知识增长与政治文明的演进》。

首先我来讲一下什么是政治学。我讲的政治学跟大家中学所学的政治和大家现在所认为的政治还是有差别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研究的政治严格来讲是一种统治的学问，治理国家的学问。它也是一种知识。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从人类知识的增长开始引出我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一下知识与政治知识。知识这个概念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崇尚知识。事实上，很多大思想家对知识的功能和作用有过非常有名的论述。比如说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他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知识”。这个就涉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怎么来理解的问题。就是说道德教育要通过知识教育为载体。我们也知道培根讲过“知识就是力量”，也是一种说法。我记得后来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公益性的广告，提出了几个字叫“知识改变命运”。我觉得这些对知识的评价已经非常高了。我们说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德，之所以能够成为力量，之所以能够改变命运，就因为知识具有独特的功能，



主讲人介绍：桑玉成，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文科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代表著作：《经济发展之政治观》《论政府管理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廉价政府：一种新的廉政观》《论政府成本意识的确立及其意义》《论和谐社会政治基础》。

什么功能呢？马克思讲了，知识能够使得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当我们掌握了知识，我们就能够准确地认识世界，同时也能够治理、操作这个世界。我们说人之所以是大自然中最伟大、最高级的动物，就是人具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我们今天的人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可以最充分地享受到人类最新知识成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生活、工作上的便利。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通俗也非常精辟的话，他说我们今天的工人生活可能比 200 多年前的国王还要好。就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先进的、发达的知识成果。比如说我中午 12 点从上海机场起飞，1 个小时就到了南昌，晚上就坐在这里给大家开讲座，这样一种交通便利环境，即便在 50 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的人非常幸运，能够享受到人类最新的知识成果带给我们的便利。大致说来，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另一种就是关于社会、政治的知识。因为马克思说了，人类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两种，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当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样两类知识方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人类关于自然的方面，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潜能，可以说是无穷的。刚才我说，我们已经享受到人类知识带来的成果，人类现在可以克隆人，可以上宇宙空间，我们过去办不到的事情今天能够做得到。说不定，我们今天办不到的事情，若干年以后人就可以办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类关于政治知识，关于社会知识方面要滞后得多。人类在自然方面可以克隆人，可以上宇宙空间，但是人类在处理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时候还显得力不从心，显得实力不足。这个并不是说人类没有在做努力。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做努力，人类的知识也在增长，但是政治知识的增长要比自然知识的增长要慢得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说过类似的话，说我们研究的政治学说，就是人类所有知识当中最复杂、最难的一门艺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分别都有类似的话。为什么人类的政治知识相对要滞后，这个主要是因为人的复杂性永远要大于自然的复杂性。在很多思想家看来，自然界再复杂，人类都有可能征服它。人是有思想的，所以才造成了人的本身思想冲突。就是说人的复杂性无论如何你是搞不清楚的。譬如我们说的“巴以冲突”，这些领导人就不能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吗？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的仁人志士，思想家、政治家，都为这个事情伤透脑筋，也做过努力，甚至也献过身，



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解决不了,我们也很难想象,所以我讲人类是复杂的。关于人类,怎样有效地把人类组织起来,光靠知识本身还是很复杂的。不要说治理国家,就是治理一个单位几十号人,有些问题都很复杂。这个复杂性,就是人类一直面临着的困境和矛盾。比如说民主。民主从来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想。从古希腊开始,到现在为止,人家还一直在坚持要为民主而奋斗。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民主是不好的东西。民主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本来就不大赞成把民主的问题复杂化。民主的问题有人说很复杂,我说很简单。到目前为止,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中,真正称得上是民主的国家依然是少数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很沉重的启示。为什么民主成为共同的政治理想,成为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却实现不了?这就是我讲的人类的复杂性问题。反过来,还有个命题就是腐败问题。应该说绝对没有人说腐败是个好东西,但是腐败却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哪一个国家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上都有腐败的问题。就说我们中国,腐败的问题也蛮严重的。不过,国家近几年来一直就没有放松对腐败的打击和整治力度。但是这个腐败就像病情一样,知道你生病了,又没有药给你治好。我从这些角度来讲政治知识,确实确实是人类的最复杂、最难的一门艺术。我想如果谁能解决腐败问题,就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同样,谁能够把“巴以冲突”解决了,那也是毫无疑问要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是为什么我讲政治知识是最难、最复杂的一门艺术。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的是政治知识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然政治知识这么复杂,那它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政治知识要解决的问题,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政治知识首先要构造人类美好生活的蓝图,并且把它付诸实践。政治知识首先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这个价值观就是构造美好生活的蓝图。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讲过,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天生就是要政治生活的,那么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最美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的。我们来考虑一下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美好的社会?这个在古希腊是个传统,古希腊的大多数思想家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柏拉图主要是探讨正义,认为正义应该成为美好生活的一个核心,如果要想实现正义,就要靠知识来解决,所以知识就是美德。再比如亚里士多德讲人的最高境界是善,国家是人的组合,那么国家就应该是最高的善,如果一个人类社会普遍实现了

善的事业,这就是最好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传统,后来,很多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探讨过这个蓝图。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政治知识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我们刚才说了,人类通过自然知识的成果,获得很多生活上的便利,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政治知识的成果。它给我们带来了安定、和平的社会生活。人类两次世界大战,给世人一个警醒,这个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所以,很多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的浪潮,共同企求和平。所以联合国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二战一结束,就诞生了一个联合国。为什么要诞生联合国,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国际的机制,来避免人类的冲突。所以我说,有矛盾有冲突,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暴力的方式。就像巴以冲突,现在是恶性循环,以暴制暴。所以在人类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之所以说它滞后,有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采取最原始、最残酷的手段,包括美国打伊拉克。那么能不能有个和平的方式,非暴力手段?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这个非暴力的思潮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家都不希望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纷争。在国际法上,有过一个条约,承认战争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当国家与国家发生冲突时,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通过战争也是一种途径。这曾经有过,但是现代社会,特别是二战以后,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的矛盾和冲突这样一种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同样,国内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官员越来越感到工作难做,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进步。怎么工作难做呢?很多地方过去的工作叫做“一棍子打死”这样一种方式,过去都是政府说了算,而坚强后盾就是暴力,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庭。这四个机关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也足够摆平。这是最后的手段,但不是文明的手段,不是现代政治知识的成果。现在就变成了“讨价还价”的战略了。这个不是狭义上讲价钱的“讨价还价”,而是老百姓跟政府都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上海也有这个问题,包括拆迁的矛盾等等。第三个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政治要使得构造这个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各得其所、和谐生存、共存共荣。也就是说矛盾和冲突已不算了,还要让所有成员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能够有一个和谐生存的环境,这也是政治知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一个社会,毫无疑问是分化的,什么叫分化呢?分化就是说,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当老百姓,你说大家都是人,为什么要有区别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分化,很多人都解释不了。事实上很多人是



解释不了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解释肯定很多人不相信,他说人是由不同材料组成的。他把人的组成材料分成三种,一种是黄金做的;一种是白银做的;还有一种是铜铁做的。那么黄金做的人呢,就是当官的,当统治者;白银做成的就是当护卫者;铜铁做成的人就是当老百姓,当劳动者。同样亚里士多德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是自然的演化,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当民,就像有的人做父母而有的人做子女一样。同样,社会分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有的人富裕,有的人贫穷。特别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富的人富得流油,穷的人太苦。这个也是事实。两极分化、贫富差别是怎么造成的?哪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说的问题就是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没有人能抹平这种分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注意到,南昌也应该是这样,原来是看不出来,现在明显看出来了,在上海专门有高档的社区,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人住的。专门有特定阶层的生活环境,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敢去的,看都不敢看。但是也有很贫穷的。所以社会没有办法把它抹平,社会要有一个机制,就是政治知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当民的,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都能够有一席之地,共生共荣,和谐生存。这也是政治知识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有人到上海去打工,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身上带的钱又用完了,我跟一些公安部门的人说,这已经超出你们公安部门所能解决的范围了。我再进一步说,这些人钱用完了,工作又找不到,没有任何收入,但是他要吃饭,他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只能是盗窃,偷东西呀,或者偷路边井盖什么的。但是现在各家、各社区保安工作做得很好,偷也不是办法,那就只好到路上去抢,反正他要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我不是说为这些人辩护,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所有的人自然地来到世间,自然来到人类这个社会,自然来到这个国家,政府就有责任使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安身之地,有他的立足之地。那么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政治知识的增长,也要有途径,也要有渠道。所以我觉得这是政治知识所要解决的三个方面。

第三个大问题我要讲的是文明与政治文明。政治知识的增长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增长。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叫摩尔根,他是19世纪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古代社会》。《古代社会》是属于考古学的一部著作,他把人类社会的阶段分成三个时期。人类社会从形成以后,它的第一个阶段叫做蒙

昧时期。人处在蒙昧时期,还未开化;第二个时期叫做野蛮时期;第三个就是文明时期。从这样一个划分法,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一条主线。摩尔根以什么作为划分的主线呢?实际上是以人类政治知识的增长、以人类社会的能力增长作为主线。蒙昧时期反映人类社会的完全无组织化、不开化,甚至都是靠采摘野果来维持生活,没有任何生产工具,那么后来再进入野蛮时期,稍微开化了,但是还是没有秩序,按照后来恩格斯对婚姻制的说法,就是有群婚制、杂婚制,一夫多妻制,非常混乱,那就是野蛮时期;再进入文明时期,人类社会和谐了,制度也有了。这是一条主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文明意味着什么?文明就意味着人类知识的增长,文明就是人类知识的积累过程。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人享受到了很多自然知识的成果,过去我们想象不到。同样,我们今天的人也想象不到,我们今天的良好社会秩序,比如我们到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机动车最多的国家,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机动车比他们的人还多。因为大家都有车。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美国的交通秩序非常好。有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数据是关于交通事故率的,就是一万辆机动车一年中会因交通事故死亡多少人。世界平均水平是万分之四点儿,也就是说一万辆车死四点儿人,而美国、加拿大是1.3左右;中国大陆是很高的,大约有十四五个人。很显然,这个就是一个差距,究竟什么原因,我们可以探讨,可能是道路问题;也有可能是车的性能问题。但是最最重要的可能是规则问题,就是交通行为人所构成的秩序问题。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作为反差,我去过好几个地方,但我发现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十字路口都站有交通警察;而绝大多数国外或境外,它就靠红绿灯作为交通标志。即使没有红绿灯,也不需要交通警察,大家靠道德秩序。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反思,要学学人家是怎样来治理这个交通的,怎么使得交通秩序这么有序。我觉得这也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所以我说政治文明是一种框架,第一个就是把人类文明安排在秩序上;第二个就意味着进步和发展。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简单说说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政治文明如果要从文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古希腊、古罗马时候就有,就是如何把人很好组织起来。关于现代文明的演进,我们还是要说这是近现代的事情。现代政治文明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端的,什么时候起源的?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是从英国产生的。英国是我们说起来很奇怪的国家,当年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曾经



也是叱咤风云,争霸世界。一战、二战以后,就被美国所取代。两个国家也成为盟国。而且英国到现在为止,还被称为不成文宪法的国家。什么叫不成文宪法?就是说其他所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恰恰你找不到英国有宪法。英国虽然没有宪法,但是英国是现代宪政制度的发源地。所以我说很奇怪。现代很多政治制度包括我们现在的议会制度、内阁制度、政党制度、军队制度、警察制度,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从英国发源的,所以我们说英国是现代宪政制度的发源地。那么现代政治文明的起源也是从英国开始的。按年代是1215年,1215年发生了一个事件,当时的国王叫约翰王,他的内政、外交都不顺利,于是就想要增加税收。这个税收的主要纳税人是当时的贵族、骑士,也就是那些有钱人。这些贵族、骑士因为国王的内政、外交不好,对他也不满意。在不满意的情况下,也不大情愿交税,但是还是不好和国王抵触的。贵族、骑士就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大宪章》,后来也叫《自由大宪章》。这个《自由大宪章》有60多条,但基本的精神有两条,一条大致意思是说国王以后要征税,必须通过贵族会议的同意;第二条是说如果你要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要拘捕什么人,就必须通过法庭的公开审理,这个法庭是贵族会议组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开创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项权利,一个叫财权,一个叫做人权。这在一方称为“权利”,在另一方——国王那里就是“权力”。这两项权力从国王这个地方就受到了限制,本来国王是有这些权力的,现在对国王进行了限制。当时由于国王的内政、外交都不好嘛,就急着要钱,国王也不得不在宪章上签字。签了字以后,这项宪章就成为英国宪政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文件。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跟欧洲包括英国都曾经有过一个相类似的经历,就是有过一个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但是就是从1215年开始,中国的专制主义跟英国的专制主义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什么不同呢?从那个时候的英国开始,欧洲国王的权力就受到了社会的挑战,社会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以至于后来一直在限制,限制到以后,像现在的英国就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王还是有的,但是国王没有任何权力,成为国家的象征,成为一个零。反过来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就从来没受到什么限制,反而是越来越强化。大家看过那部片子叫《走向共和》,那里面就有句台词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的权力日益强化。邓小平也讲过旧中国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比较多,也就是这个缘故。这样就会形成政治的差异。

所以政治文明起源,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国家的权力是可以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是需要规则来规范的,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特征。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我们讲一下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走向。政治文明在发展,它也是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动态我们只能表明一种基本趋向,就是基本的发展趋势。我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从暴力政治走向非暴力政治。这是我们始终强调的。暴力政治肯定是一个不文明的表现。我们过去说,政治是什么,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这个不是文明的用语。文明状况下,应当是讲共存,谈判,协商。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所以,传统的不文明政治是以权力作为中心的,就是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现代文明下的政治是以公民的权利作为中心的,也就是权力要服从权利。三、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传统的不文明状态下的政治是无序的。以前,比如前苏联,那些领导人的任期都是无序的。要么是死了以后被接任,要么是被不正常手段给搞下台的。四、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传统的不文明状态下,政府是全能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他愿意,没有干不了的事;现代文明条件下,政府是有限的,这有个价值的取向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的人还羡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社会主义国家造一条高速公路,可以造成笔直的,遇到民宅、工厂,都是可以拆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路都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是弯曲的,因为修路的时候,遇到人家的房子。他不肯拆除,不肯卖,你也没办法。那高速公路只好转弯,再绕过去。五、从垂直政治走向协同政治。统治与被统治是一条直线,是垂直的关系。但是现代文明条件下,很多国家开始协同治理,讲协同政治。也就是政府与公民、官员与老百姓大家合作,官民协同治理。就是说官与民共同承担责任。

第六个问题我讲一下政治文明的演进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自从2002年江泽民提出三个文明共同发展、共同推进的战略后,政治文明的问题也成为我们讨论、研究的热点。很显然,我们在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当中也必然要提出政治发展的问題。为什么现在要讲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呢?就是强调政府不能以人均GDP、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作为目标。其他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发展也是一个目标,也是我们领导干部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的主导方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现代政治文明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有三个基本结



论:一、政治文明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实际上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即使我们盖一座楼房,也要一个工期。这个政治文明似乎比其他任何东西的发展要更困难。刚才说了民主政治很好,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搞不好呢?确实这里面太复杂了,这也是一个演进、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有些东西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二、政治文明、政治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政治建设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制约作用。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说美国的政治很不错,无论是从学术界还是从社会科学界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很完善的。这一点也不假。很多国家也想学,但是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学像的。这并不是说不懂美国制度是怎么回事。这里就有个生态环境的因素。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人文的、自然的生态环境都会起作用。三、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十六大报告里面,江泽民也讲过这句话,说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人类肯定有一些共同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在政治领域。

我今天讲的就这么多,这些完全是我在教学研究过程中的心得和体会,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 欧阳康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华东交通大学！我跟这所学校有两种特殊的缘分：一是这所学校的老师、领导中有很多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像高海生副校长，他不仅是我们学校优秀的校友，还是华中科技大学江西校友会的会长。正因为如此，我到华东交通大学就感到非常亲切。二是我曾经当过工人——铁路工人，而我们学校有“交通”二字，并以铁路交通见长，为此也感到特别亲切。能在今天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来这里做演讲我很荣幸。因为明天是贵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日子。在中国的当代大学里，要想成为一所大学，就会有很多的理念、标准和检测等等，而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是由上而下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它决定了一所大学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这种评估是一个学校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一个重要步骤。大家肯定都参加了很多迎评的准备活动。为期7天的评估不是目的，通过迎接评估的准备工作并通过这种评估活动把我们的硬件、软件，尤其是我们的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所以高校长当初邀请我在这段时间里来讲

主讲人介绍：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形态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实践的唯物主义、人和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和当代形态、哲学教育与教学改革。代表著作：《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社会认识方法论》《欧阳康自选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认识论》。

学,我非常荣幸。这里我有着一个良好的祝愿,祝贵校能在这次评估中取得好成绩。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现代化从产生以来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有了一个半多世纪。中国学者对它进行学术思想的探讨,至少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而当代中国,即1949年以后的中国,对现代化关注也有很长时间了。中国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提出和追寻现代化也有了这么长的时期,今天为什么还要来谈现代化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而是所有中国人一个久远的期盼,特别是近代乃至当代中国人一个伟大的梦。实现这个梦想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或者标志就是能够达到甚至超越世界现代化水平。而围绕世界现代化,实际存在着很多的争论。比如说,今天世界的每一次大规模政治首脑会议上,都会有一批人在会场外摇旗抗议,表示反对现代化,反对全球化。围绕现代化,不仅有许多学术的争论,也存在着很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要和这种背景联系起来,才能找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怎么来探讨这个宏大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争取做到三个结合:第一个是结合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有的人调侃我们这代人说:当他们还是小孩子,该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自然灾害,缺吃少穿;当他们该上学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当他们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当他们该谈恋爱的时候,遇上了晚婚政策;好不容易找到了对象结了婚,遇上了计划生育,只能有独生子女;当他们过了上学的年龄,又有了上学的机会。我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届考上了大学的。当时我是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初中、高中的课本全看了一遍,才进了考场。凭着不错的精神状态,混进了大学。当我们大家身强力壮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不幸的,而我却认为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的幸运在于两点:一是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了共和国。有这个体验和没有这个体验对于今天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今天大家有这么好的条件不太知道珍惜,而我们却十分珍惜那时所能得到的很差的条件,更不用说今天了。所以用这种生命体验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恰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要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多么的艰辛;二是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共和国的

发展历程中来,能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这个发展历程中,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做事情有明确的方向,这是另外一个幸运所在。第二个结合是结合我自己对国际学术文化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们这一代之所以幸运还在于我们抓住了共和国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机遇。当我们上本科时候,国家恢复了硕士学位;当我们硕士快毕业的时候,又恢复了博士学位。这样我就有机会一连读了整整10年的书,又有机会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到国外从事学术交流。我从1991年起先后有20多次机会得到海外或国家的资助到国外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或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了变化中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在这些过程中,我自己也曾经做了一些跨文化问题的研究,比如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德国的“新种族主义和两德统一问题”,英国的“保守主义与英国现代化”,亚洲价值观,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一些文化等。通过这些,我看到了真实变化中的外部世界,也借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已经汇编成书,叫做《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该书记载了我跟国外很多著名学者的访谈和我自己的一些文化感悟与反思。结合这样一个世界文化背景,我给大家讲的全球化视野是我自己眼中的全球,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带着我自己的感性体验。第三个结合是结合我自己的专业。我是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在过去被认为是万能的。当我们还在田间工作时,遇到问题我们的队长就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学习《毛泽东语录》,希望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是由于那时候鼓吹的万能哲学,才造成了今天大家对哲学的不那么信任,不那么尊重,不那么看好。实际上,哲学能从古希腊延续到现在,是有它特殊意义的。我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选择了哲学,至今不悔而且一直对它进行着研究思考。我觉得哲学给我的生命注入了力量,给予我智慧。我自己在学习和研究哲学中更多地关注着社会认识论。我从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在国内首倡社会认识论,后来一直在培养社会认识论的硕士和博士生。我认为现代化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理解、规划和创造的问题。我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哲学上的思路与方法引入到对于现代化的探讨中,这样可以发现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尝试对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现实中的现代化困惑提供一些自己的独到看法。

首先我想谈谈我为什么会关注现代化。钱钟书的《围城》,大家都很熟悉。



钱钟书作为 20 世纪中国白话小说的巨匠,写下了不朽的《围城》。《围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关于婚姻、爱情和家庭两个比喻。一个说“婚姻就像黄金做的鸟笼子,外面的鸟想飞进去,里面的鸟却拼命地想飞出来”。比如现在又流行一句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另外一个比喻是说婚姻像一个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城,城里的人却想冲出城。钱钟书的这本小说是现代中国的白话小说里面为数不多的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我在英国读到英文版的《围城》时,与在国内读有所不同,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受,叫“文化围城”。1994 年,我接到教育部通过学校传过来的一个通知,说我入选了英国的一个学术交流基金。当时英国人之所以要搞这个基金,目的很明确,不甘心当时有大量的人才到美国留学成为所谓“亲美派”,也希望招收一些优秀的学者到英国去以培养“亲英派”。当时英国人对我们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提供了一切费用和可能的帮助。去了之后,英国人定期把我们叫在一起座谈,大概想听听我们的好话。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用英语就说不错,用中文就说“不好”,大家感到极不适应。本来选择去英国是觉得英国的文化比美国文化要深厚的多,认为到英国去可以学到正宗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可英国的现实和我们对于英国的向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强劲势头之中。中国人高度开放的心态与当时英国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5 年,当时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统治了英国 18 年,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并且又赶上了疯牛病,市场一片萧条。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围城”。中国人向往西方文化,西方人也在向往中国文化。我曾经送了一套很普通的木制十二生肖给一位喜爱中国文化的美国教授,他非常高兴,便讲了一番话:“尽管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还是相信 21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当时我很高兴,不过也没敢往心里去。后来我去美国采访一位在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籍教授。他认为 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 20 世纪美国的哲学对于美国的贡献超过了美国的经济、政治对世界的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 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 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后来我在电子邮件中向他确认时,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是从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学来的。”他陈述了 21 世纪是中国世纪的 6 条理由。由此我感觉到,文化围城在东西方文化里是确实存在的。

后来我又重新感受到了一种围城——现代化的围城。2001 年对中国来说